

第4期（总第171期） 2020年 7月3日

**本期导读**

|  |  |
| --- | --- |
| **研究前沿** | 关于全球贫困测算方法的研究 |
| **减贫前线** | 尼泊尔在新冠疫情期间加速推广远程学习 |
| **书籍推荐** | 书评：《穷人的银行家：小微贷款与全球减贫斗争》 |
|  |  |
|  |  |

·**机构专刊**·

*·研究前沿·*

**关于全球贫困测算方法的研究**

Martin Ravallion

**摘要**：这篇论文批判性地评估了当前主流的全球贫困测算方法。本文使用一种规范性运作的理念，对全球贫困线的功利主义解读作出了修正，而该方法所引发的成本，则因其实施的国家不同而各有不同。有鉴于此，当前使用的绝对量测算法似乎忽略了福利所受到的重要社会效应，而广受欢迎的、具有强相对性的测算方法，则忽略了生活质量的绝对水平。有人认为，需要开发一种全新的混合方法，将绝对测算法和弱相对测算法结合起来，从而与各国贫困线标准的差异化事实相适应。本文进行了说明性的计算，表明在过去30年全球贫困率正在下降，而这一结果主要源自发展中国家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尽管以全球绝对标准来看，贫困人口在减少，但是在国别相对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当前，不论以绝对标准，还是以相对标准衡量，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关键词**：贫困；价格；贫困线；功能；营养；相对收入

**一、引言**

贫困测算结果一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一百多年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首位统计学教授Arthur Bowley（1995，p.213）曾写道：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或许没有比贫困人口比例更好的检验指标。而对于观察这一进程所选择的确切标准而言，如果它没有时时变化，那么就不会特别重要。”

通过使用贫困测算评估社会进步，20世纪下半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无论贫富，都获得了发展动力（Ravallion，2016）。通过这些测算结果，贫困问题所获得的关注，超过过去三百年中的任何时候。[[1]](#footnote-0)

时至今日，我们发现了两个主要的贫困测算与减贫进度监测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关注“绝对”的测算结果，力求使用不变的绝对值制定贫困线标准，与Bowley的建议相符。例如，美国的官方贫困测算就是采用这种方式。世界银行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测算全球贫困，并希望以这种方式对所有国家在不同时期都采用一种“严格不变”的真实标准。第二种方法使用一种“相对”的测算方式，所使用的贫困线标准随真实变量而变化，通常设定为某国人民生活水平均值或中值的一个固定比例。这一方法产生于1960年代，并于20世纪后期在西欧受到广泛采用。关于绝对和相对测算方法孰优孰劣，一直以来都存在较大争议。

本文对两种方法的经济学基础给出了批判式的总览，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两种方法是否都真的有效？本文的回答是“不”。我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测算、监控全球范围内的贫困情况。

在本文的定义下，贫困是一种客观的“经济受剥夺”的概念——它代表了较低的“经济福利”，或是“生活标准”[[2]](#footnote-1)。“贫困线”是一种用货币度量的福利标准，国际贫困线则代表在某一时点、某一国家达到某一特定经济福利水平所需要的货币水平，这个标准一直被跨国、跨时期使用，以测算全球贫困水平和减贫进展。

如何测算经济福利？入户调查的质量非常重要。在提升数据质量的同时，调查中受访者的选择性配合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测算家庭消费和收入过程中所作的前提假设可能也会影响调查质量：比如通常我们会假定家庭收入会在家庭内部分配，但事实或许并不总是如此。价格指数的选择也很重要。 尽管上述因素的处理都极富挑战性，但它们却并非贫困测算的内在决定因素（在测算真实收入水平及其分布，以及政策评估中，这些因素会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在本文中不会对这些因素做过多讨论[[3]](#footnote-2)。

对贫困测算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的一个潜在争议论题是，个人在某个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是否重要。当前现有的贫困测算方法，根据其所属于绝对或相对测算方法的不同，倾向于在以下两个不同的假设下选择一个：

**·相对收入水平对于测算经济福利并不重要；**

**·相对收入水平是唯一重要的经济福利指标。**

我们认为两种作法都是不合理的。当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测算贫困时，Bowley所支持的固定真实贫困线就无法获取国家层面上贫困人口受到相对经济剥夺的情况，也无法获知发达国家为提高经济福祉而增加支出的相应需求。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一个固定相对收入水平下的绝对生活水平标准也很重要——因此，我们也排除了那些将贫困线设定为均值或中值固定比例的作法。

尽管福利一致性原则在评估不同方法的选择时很有价值，但是它并没有涉及何种福利水平应当被定义为“贫困”。在这一方面，业界人士已经在寻求其他来源的指导意见，包括官方建议的营养摄入标准。

借鉴阿马蒂亚·森（1983）的能力理论，营养状况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人福利水平（或是能力水平）的关键决定要素。然而，营养状况也只是功能性指标的其中一种，其他一些指标同样重要。一旦我们将社会包容度视作一种福利相关的功能性指标，并且研究贫困线标准在实践中如何变化，就能够获取全球贫困更清晰的图景，而不再需要维持前述的诸多假设。

本文第二节，将先讨论绝对、相对贫困测算法的理论基础。第三节将对现行的国家贫困线标准进行回顾概述。第四节和第五节回顾当前对两类测算方法的应用情况，以及文献当中的相关证据。对相应全球贫困测算法，我们还提供了一些说明性的计算过程。第六节总结全文。

**二、理论起点**

在考虑全球贫困测算方法时可以使用两种理论框架：福利主义方法和能力理论。本文对这两套框架都会进行讨论。本节将首先描述一个福利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如果一些人所获得的经济福利水平低于某个关键水平，那么他们就会被认为是“贫困”的。作为一个道德起点，贫困水平在一些公认的福利空间中是以绝对量相互比较的，尽管它们在消费或收入空间中，可能取绝对量或相对量的其中一种。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看待经济福利。在能力理论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用的洞见。

为了同时涵盖绝对测算法与相对测算法，让我们假设一个家庭中某个人的消费或收入水平为y，面临的价格水平为向量p，个人特征变量x（其中包含了家庭与环境特点），他的福利水平就能用) 来表示。其中m是该国居民收入的均值（或中值）。函数v设定为对y平滑严格单增，对y/m非递减。在绝对贫困测算法中，v(·）不随y/m而变化，而相对测算法则允许v(·）随y/m严格递增。

由此，福利一致的国际贫困线z的隐式定义如下：

 (1)

此处 是非贫困人口的福利水平。“福利一致性”原则在全球贫困测算中要求在所有国家都是固定的。在这些假设下，我们能够看到 就等价于（1）式中z的解可以写为：

 (2)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观察国家贫困线来识别函数z(·），那么我们就能够获悉福利方程背后最为关键的特点（第3节将会回到这个话题）。即使没有任何数据，我们也能够立刻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关于绝对与相对测算方法之争的相关信息。很容易验证（2）式中z的解将会随着均值递增，其弹性为小于1的正值，从而形成一簇“弱相对”曲线（具体定义可见Ravallion & Chen，2011）[[4]](#footnote-3)。 强相对曲线仅仅在一些限制较强的情形下才会出现：在给定y/m下，v(·)不随y变化，但是严格对y/m。此时。

这样的表述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在怎样的参考福利水平（1式中）之下，个人才会不被定义为贫困？有人可能会质疑这样的说法太具任意性，而且在这样的选择下仅仅要求内部的一致性。这样的结论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对参考福利水平的选择往往会影响测算过程和结果，从而影响政策寓意。在测算中设置参考福利水平是应用经济学中长久以来普遍公认的一大问题。任何实际应用中的价格指数都隐含着某种福利锚定，指数（通常）会随着参考福利水平变化。（例如，国家消费者价格指数通常锚定于收入分布均值或中位数附近家庭的消费篮子。）这一问题对于测算的挑战始终存在，难以忽视。

能力理论当中的功利性（functioning）概念有助于我们思考（1）式中的问题。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福利”是被消费商品的函数——代表偏好的效用函数。长久以来，学界普遍认同此种效用函数无法被合理地视为独立于个人特征。然而，更可信的情形是福利作为一种稳定的、人际可比较的、由个人所作所为而决定的函数——他或她的功利函数[[5]](#footnote-4)。有两项“功利”对于贫困测算较为重要：营养状况与社会包容。功利性概念为消费者选择的标准模型提供了额外的结构性层面——该层面有助于解决贫困测算结果在具有不同特点的个人之间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识别问题。

由此，经济福利可以由一个原始的福利方程所代表，该函数被视作标量，并且在功利向量f中单调递增。前提假设是是稳定的、人际可比的。尽管个人特征（向量x）可能存在影响福利的差异，但我们假定它们只在影响功能性的情况下对经济福利产生影响，因此在我们评估贫困的过程中，可以被我们视为经济福利的原始影响因素。这一点完全可以与此前我们设置的福利方程)相调和，但前提是更高的收入能够产生“功能”。当然，福利也会取决于相对收入、价格和个人特征，因此，函数形式可以写为)，一个向量值函数。

要锚定经济福利的参考水平，从而决定谁是“贫困者”，就要求设定一个具有固定名义功利水平的向量f\*。举例而言，针对营养水平的名义功利性要求营养必须达到一个规定水平，才能保障良好的健康状态和常规活动。而针对社会包容的功利性名义指标则可能要求一个人拥有被社会接受的衣着和居住条件。因此，对于（1）式、（2）式中的参考福利水平应该如何设定，我们至少在理论上拥有了一个答案，我们将其规定为 )。在实际操作中，决定 和)时仍存在问题，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功能性指标中必须作出取舍。

上文的表述或许比能力方法的要求更为苛刻，后者仅需要确定名义函数是否能够计算一个已知y、m、p和x的个人的福利水平。Sen（1983，1985）指出，贫困应该由能力来评估，而能力的定义应该是一个人所能够获得的功利性——也就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机会，而不是他所获得的真实结果。在这个语境下，并未对功利性作出明确的福利方程定义。但是这种程度更高的普遍性也有一定代价。这其中存在着取舍——某一种功利性的加强，往往意味着另一种功利性的减弱。在不同的个人之间比较谁更贫穷，常常需要诉诸于某一种形如的福利函数。

关于我们后续进行的讨论，可以先作出一些评论：

·显然，这是赋予了“贫困”更为广泛的概念，比原来仅仅基于货币收入或支出的定义更为丰富。此处“收入”只是代表基础多维福利函数的一种方便的度量。自然，使用货币指标代表福利并不意味着我们相信人们仅仅在乎他们的收入。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测算指标往往被视为是不完整的，需要补充性的测算方法来捕捉被遗漏的要素。常见的例子包括对非市售商品的可得性，以及家庭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或者，我们可以将这许多测算方法，看作能力理论的多维实施范例，而“经济福利”则是其中一种[[6]](#footnote-5)。

·这一方法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测算绝对贫困的方法，但它的绝对意义是在福利空间中而言的。相对收入是直接进入福利函数的，但我们同样可以假定向量x中包含了环境层面中与福利相关的因素。营养摄入取决于食物消费（数量与结构）以及当地的环境，后者将影响人们的膳食习惯、健康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营养摄入。相似的，社会包容也取决于个人消费水平与当地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可感知的相对受剥夺水平，以及当地的风险分担情况。

·以上表述并没有将“经济福利”等同于消费效用最大化选择问题。我们已经可以假定一个更为深入的模型，其中个人的功利性与所消费的商品与社会常规的相对水平有关，并通过最大化经济福利来选择消费数量。（2）式中的函数 即为消费者的支出函数。这为贫困线的设置提供了说明：一个“贫困集束”中的商品成本，即效用补偿需求向量，位于效用函数)的无差别曲面之上[[7]](#footnote-6)：

 (3)

·然而，我们或许需要考虑一个比较强的假设：u(f)是选择最大化的。我们或许可以在不假设最大化u(f)的情况下，通过u(f)评估个人的经济福利。作为替代，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主观福利”函数，。x中的一些要素，例如个人特征，可能对U很重要，但却不影响u。（例如，有的人可能“虽然贫穷但是快乐”。）消费选择只会在 （或其仿射变换）对m、x可加可分时，才会最大化 。如果没有此种可分离性，个人所作出的选择以及所获得的功能性，将会取决于主管福利函数U。这一结论的含义在于，我们不能仅通过观察消费选择和功利性是如何随价格、收入与个人特点而变化的，就一般性地推断出个人的贫困状况[[8]](#footnote-7)，而是需要一个来自外部的判断。

·即使名义功利性在不同的国家都相同，达到该水平所需的贫困线水平仍将随p、m和x变化，这可以解释为实现功能性f\*所需要的成本差异。如前所述，更富有的国家面临更高的成本，反之亦然。

·将贫困线针对与福利相关的某一种功能性（或是某一组功能性子集）进行校准，在一般意义上无法保证福利的一致性。例如，假定我们找到了一种基于营养水平的贫困线，如果个人营养水平达到阈值() 即判定其为非贫困。

 (4)

这个等式无法让我们推出，除非提前假定经济福利仅仅取决于营养状态()。我们将在第四节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在实践中较为普遍的做法，可以看作是一种近似——通常是一种粗略的近似——如果我们参照以上讨论的“理想情况”[[9]](#footnote-8)。

**三、国家贫困线**

各国的国家贫困线通常会被用作设置国际贫困线的数据源[[10]](#footnote-9)。因此，我们应该理解这些贫困线是如何设置的，并且了解不同国家贫困线之间的差异。

既有的营养要求（例如WHO在1985年的规定标准）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设置国家级贫困线标准。从许多角度看，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使用的贫困线标准都具有很高的锚定特征（Ravallion，2012）[[11]](#footnote-10)。（许多富裕国家使用强相对标准线，我们在第五节中会讨论这一问题。）众所周知，当营养摄入量持续低于某些水平时，一些常见的健康风险会增加，尽管特定的个体仍可以保持健康和正常的生活。这些营养“要求”是一种平均数，其中包含对于正常儿童成长、活动所需摄入营养水平的假设。

设定国家贫困线的一个常用方法是指定一系列食品，这些食品能够包含个人所需要的足够营养，然后再对整个篮子的当地价格进行加总。通常，设置贫困线时会允许纳入非食物类支出，这种支出常常与食品恩格尔曲线相绑定[[12]](#footnote-11)。例如，美国的官方贫困线设定为1962年“经济食物计划”规定水平的三倍（Orshansky，1965）；三倍显示标准制定者假定食物占比应该是全家支出的三分之一（这一贫困线水平多次根据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了更新）。另一个常见的方法是在特定情况之下，在基本营养需求得到满足时，估计总消费支出或收入水平（这可以看作是对（4）式随机形式的逆运算）。

但是，所有这些贫困线的设定都考虑了不可回避的规范因素。营养需求取决于假定的体育活动水平，这是一个基于判断的问题。同时，如何选择食物和非食物需求，也是达到任何给定营养需求所必需的要素，同样需要一定的判断。我们可以预见到，在制定这些标准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判断被提出并得到论证，而这些判断无疑会随着条件变化（相关的地点、时间、测算的目的）而变化[[13]](#footnote-12)。

图1显示了近期各国所使用的国家贫困线的一个汇编结果，转换的方法是将各国的当地货币单位（LCU）按照购买力平价原则（PPP），使用2011年国际比较计划（ICP）的数据进行折算。

图1显示了使用2011年国际比较计划（ICP）的结果从各个本地货币单位（LCU）转换为购买力平价（PPP）的国家线的最新汇编。（我们将在第4节中回来讨论PPP的问题。）

这些是从国家或世界银行为构建适合每个国家的贫困线而做出的努力中得出的。 最初的路线当然不使用购买力平价，而是根据当地价格和当地对“贫困”的理解而设定的，通常都固定在设定的最低营养摄入量和流行饮食上。国家线是由国家政府（国家统计局，几乎总是由国家统计局）确定的，或者由世界银行在其国家级分析工作中确定的，通常是与有关国家的政府协商确定的。图中的结果来自各国、世界银行为不同国家设置合理贫困线的努力。最初的贫困线设定并没有使用PPP原则，而是多采用当地价格和当地对于“贫困”含义的理解，后者往往会与某种最低限度的营养摄入、膳食结构相锚定。国家级贫困线通常的设置机构是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大多时候是国家统计局）或世界银行在该国的国家级分析机构，后者通常也会与该国政府保持沟通协作。我们会看到富有的国家常常有着更高的贫困线标准。图1当中的拟合非常接近于线性，但却不是齐次的。图中存在一个正的截距项，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认为随着平均收入水平的下降，贫困线的下限有降到0的可能性。例如在非OECD国家，平均收入最低国家的贫困线预测水平是每天0.96美元（标准差为0.25美元）[[14]](#footnote-13)。因此，图1当中的跨国数据显示了一种弹性小于1的弱相对贫困线。同时，它的弹性随着均值上升，在最低均值处约为0.36（标准差0.12），在高收入国家则接近1。

图1使用了截面数据，因此上述模式在各国贫困线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可能受到潜在特定国家效应的影响。尽管这些贫困线标准很少频繁调整——因为存在（可以理解的）政治阻力——但它们还是会随着总体生活标准的提高，不断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在富裕国家，过去一百年中贫困线标准在不断提高。例如，在20世纪初，美国最广为使用的贫困线标准按2005年价格计算大概是每人每天1美元，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接近15美元(Ravallion, 2016)。近年来，我们也开始观察到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其真实贫困线水平[[15]](#footnote-14)。可以使用Jolliffe & Prydz（2017）的隐含国家贫困线数据集，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线是否表现为弱相对贫困线进行更令人信服的检验。前者的数据集有着足够的跨期观测值来允许面板数据分析[[16]](#footnote-15)。由此，我们发现国家贫困线和消费均值之间存在强烈的正向关系，即使在使用国家固定效应模型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使用对数调查均值对对数贫困线水平（PPP平价）进行回归，同时包含102个可得国家的固定效应，我们可以发现平均的弹性水平是0.52（标准差0.04，观测值598）[[17]](#footnote-16)。

因此，我们得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线在跨期过程中具有隐含弱相对贫困线的属性，平均弹性在0.5左右，显著为正，但显著小于1。

我们可以使用第二节当中的模型来解读这一模式。图1当中的国家贫困线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常规功能性的当地成本。常规功能性水平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实现这些功利性的成本也会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富裕国家，社会包容的成本肯定更高，因为在富裕国家，商品价格（这里可以包含非交易性商品）和确保实现常规功能性所必需的商品需求都会更高。

然而，我们无法保证各国贫困线所对应的常规功能性水平能够符合所有道德评判者的标准。在进行全球贫困比较的过程中，太过纠结于所观察到的最低水平的国家贫困线是不明智的。很显然我们需要作出一些平均化的处理，并且对使用更高水平的贫困线作出稳健性检验。需要作出平均化处理的原因在于，在给定的平均收入水平下，各国之间用来界定贫困线的方法和规范标准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在观察到的国家贫困线中几乎可以肯定存在一些随机测量误差，平均化处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在使用国家贫困线来制定全球范围内具有福利一致性的全球贫困线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可能存在的识别问题。较高的国家贫困线可能反映出获取给定经济福利水平时所需付出的成本更高，或是在定义贫困者时存在更高的福利参照水平（在（1）和（2）中更高的）。这种识别问题缺乏一种解决方式，我们可以认为，绝对和（弱）相对贫困测算方法所得到的的结果分别应该被视为构建一种真正具有福利一致性贫困测算方法的上下界(Ravallion & Chen, 2011, 2019; Ravallion, 2016)。

当使用名义功利性作为福利参照水平的锚来构建贫困线时（第二节），也会出现这种识别问题，因为更富有的国家往往会采用更为慷慨的名义功利性水平。然而，如果有人使用非福利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说对任何一种被某一社会视为重要的名义功利性水平都给予足够尊重，从而并不要求福利一致性——那么此时就不需要担心识别问题。这是Atkinson＆Bourguignon（2001）所考虑的方法（在Atkinson2019年的论文中有更深入的讨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对于论证强相对贫困线的合理性并无帮助。

**四、绝对贫困测算**

在其全球减贫的大部分工作中，世界银行坚持认为，全球贫困线在各国之间的购买力应保持不变。在测算全球贫困率时，这相当于使用实际家庭人均消费（或在没有消费时的可支配收入）作为福利标准。本节考察了世界银行的方法，以及最近提出的一个替代方法。

**购买力平价**：在测算全球贫困时，最广泛使用的价格指数是根据比较方案在国家一级的价格调查中得出的购买力平价率。基于这些价格所得到的的标准化购买力平价基本可以看作是费希尔价格指数的多国版本。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而不是市场或官方汇率)换算LCU，被认为能更好地反映每个国家人民实际面临的价格。官方汇率不能用于此目的，因为许多商品不进行国际交易，而且在工资率较低的穷国，官方汇率往往更便宜。因此，市场汇率被认为夸大了贫困国家的生活费，从而夸大了全球贫困的程度。

关于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式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中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现行的购买力平价是为了比较各国的国民账户总量而设计的，而非为了测算贫困。“穷人的购买力平价”是Deaton & Dupriez（2011年）估计的一个指标，他们根据入户调查数据，构建了一套符合位于国际贫困线附近居民消费模式的购买力平价体系。事实证明，基于Deaton-Dupriez的贫困人口购买力平价和2005年ICP调查数据的标准购买力平价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Chen & Ravallion, 2010）。Dikhanov等人（2017）利用2011年非洲ICP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一结论并不是因为穷人的消费模式与国民账户中的平均数相似，而是因为所需的重新加权在各国之间具有相似的结构。

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ICP的方法是否充分处理了住房问题，因为住房是“不适合比较”商品的一个例子，因为研究者很难在各国之间随时观察到居住消费的可比价格(另一个例子是政府服务)（Deaton和Heston，2010年）。富裕国家的住房租金权重过低，原因可能是在购买力平价中使用了跨国商品类别的平均权重。因此，我们在测算全球绝对贫困程度时，或许有理由在较富裕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设定较高的贫困线，以适当反映潜在的贫困程度差异。(世界银行目前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富国纳入PovcalNet，但采用同样的购买力平价线)。

由于方法变化和新数据的出炉，每一轮次新的ICP都会调整购买力平价。在解决上述问题时，例如对于如何处理不适合比较的服务消费，减贫工作者也尝试了不同的方法。但这些作法引起了一些疑问和混淆。例如，Deaton（2010）、Allen（2017）都认为世界银行的方法表明“印度的贫困人口在持续增加，尽管印度的经济也在持续增长——这是一个不准确的结果” (p.3691)。

然而，Allen（2017）实际上并不是指印度的贫困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世界银行的方法长期以来也一直表明，印度的贫困率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例如Datt & Ravallion（2011）。相反，Allen（2017）的评论是指使用新旧购买力平价（由于ICP基年不同，方法不同）的两组估计数之间的比较结果。世界银行遵循标准做法，只在ICP基年进行购买力平价换算；而在后续的时间推移中，价格调整使用当时最佳的、可获得的当地价格指数。

 PPP的变化对它的许多使用者来说一直是个谜，这往往与ICP的分散化实施有关，而且公众获取完整的ICP微观价格数据受到了限制，也加剧了这一问题。Ravallion（2018a）记录了PPP变化对市场汇率的过度敏感性，表明购买力平价相比国内平减指数，可能对国际交易商品赋予了更高的权重。这可能并不令人奇怪，因为贸易商品在价格调查中更容易进行国家间比较。但其他的问题还是存在。例如，根据2011年ICP的最后一组购买力平价指数，亚洲区域的贫困程度低于前几轮ICP，而原因并不明确。根据现有资料，Ravallion（2018a）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ICP在亚洲的实施（由亚洲开发银行负责实施）在覆盖农村地区方面做得更好，而农村地区的价格水平往往低于城市地区。然而，ICP在价格调查中偏向城市的问题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因此，亚洲执行者在方法上的改进，会引发研究者对全球贫困比较结果的担忧。

出于这种担忧，Atkinson（2019）建议，世界银行的全球减贫举措不再根据每一轮新的ICP进行调整(这一建议的作法应至少持续到2030年，即联合国规定的以每天1.9美元为标准来消除贫困的目标日期)。一些减贫领域的观察者建议就此放弃购买力平价，并提出了替代方案。本节后续将详细讨论最近的一个例子。另一种选择是使用购买力平价移动平均数。

**全球贫困线**：世界银行广为人知的减贫系列研究报告使用了多种贫困线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并测试了一些关键定性命题对于不同贫困线标准的稳健性（例如贫困是否在下降）。例如，Chen和Ravallion（2010）就使用了许多种类的贫困线；事实上，他们测试并接受了30年来所有可能被使用的贫困线标准，直至最高水平的美国官方贫困线——每天15美元（2010年价格水平，针对一户有两个小孩的四口之家）。

有人可能认为可以就此打住，宣布工作完成，并指出一般的贫困比较结果对于多种贫困线、以及大类内的测算都具有稳健性（Atkinson, 1987）。然而如前所述，许多贫困测算方法的使用者希望能够确定一条或者至多两条贫困线标准。世界银行(1990)和Ravallion等(1991)查阅了关于国家贫困线的数据，并提出在确定绝对国际贫困线时，应将重点放在贫困国家的国家级贫困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上。最贫困国家的贫困线标准，应该被理解为是全球范围内确定个人或家庭是否贫困的一种最低界限。

Ravallion等人（2009年）根据扩展、改进后的国家贫困线数据集和多种平均计算法，利用2005年ICP数据，将国际贫困线设定为每天1.25美元。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之一是确保到2030年，没有人仍然生活在这一标准以下[[18]](#footnote-17)。利用国内价格指数和2011年ICP数据，Ferreira等人(2016)将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更新为每天1.90美元。我们将其称为“基准线”。这可以理解为“低线”，任何低于此线的生活水平都很难辩解为非贫困，因为这已经是低于最贫困国家平均水平的标准线。相对更高的贫困线也可以论证为合理并得到使用。虽然世界银行PovcalNet的用户可以输入任何他想要观察的标准线，但网站的登陆页面上有3.20美元和5.50美元的贫困线的内置选项，在默认的1.90美元基准外，这些线更能代表“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困线。国际贫困线在2011年按购买力平价换算成LCU，然后根据当地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得出每个国家在每个调查日的贫困线水平。

图2显示了1981-2015年期间世界整体贫困发生率，使用世界银行的所有三条线(1.90美元、3.50美元、5.50美元)，以2011年ICP为基础，使用了撰写本报告时(2019年7月)PovcalNet中的所有数据。为了便于比较，该图还给出了以每天15美元为贫困线标准的系列数据，这大约是2011年美国的官方贫困线水平（对应一个有两个成年人的四口之家）。从整个时期来看，全球贫困率明显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后减贫进程出现了明显加速。1.9美元标准线下的贫困率从1981年的42.1%下降到1999年的28.6%（平均每年下降0.7个百分点），到2015年下降到9.9%（每年下降1.1个百分点）。2000年以前，高贫困线标准下的减贫进展很小，甚至有时止步不前。但2000年后，高线下的减贫进展明显。(当然，在极限的情况下，随着线的上升，变化率终会归零)。1981年至1999年期间，世界上生活在美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略有上升（从80.5%上升到81.8%），但随后在2015年下降到74.6%。

基于最低成本达到营养充足度的措施：鉴于上述对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的担忧，显然有必要采用不使用这些购买力平价的替代方法。Allen（2017）提出了新的全球绝对贫困的测算方法，他使用线性规划（LP）来估计特定国家达到全球固定营养需求的最低饮食成本，然后用当地价格来估算该食谱的成本，并将其选定的非食品类商品的固定捆绑支出（包括明确的住房补贴）加入其中。这一方法与传统方法的主要的区别在于贫困线的计算方式。Allen使用了ICP价格，但基于对线性规划的解，以基本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加权。

Allen在世界银行的全球贫困测算方法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的方法避免了全球贫困测算中关于如何构建和使用购买力平价的一些关切因素，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Allen的作法实际上是重新启用了早期采用过的一种方法。对于1940年的美国，Stigler（1945）计算出了达到预定营养需求的成本最小化的消费束。这可以表示为一个LP问题（尽管在Stigler作出估算时，还没有单倍法）。然而，Stigler发现，他方法中隐含的成本最小的食谱不太可能被社会所接受——即使是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美国穷人，也不认为这种方式得出的贫困线生活标准在实际行动中是可行的[[19]](#footnote-18)。这一点后来被Smith(1959)证实了，他发现很少有人(1950年代中期的密歇根州)实际消费了类似于LP解法获得的消费束中的东西。此外，人们发现最低成本食谱中食物的多样性不足，这也是营养学家所重视的问题（Masters等人2018年使用非洲数据的研究讨论了这一点）。

根据Stigler（1945）和Smith（1959）的研究结果，最小成本法被大部分文献所否定。例如（在提到Stigler的最低成本饮食法时），Sen（1981，第27页）写道：“这种最低成本饮食法通常非常便宜，但过于乏味单调，往往被认为是相当不能接受的。”在美国，官方的标准线“不是被设计成最低成本的食物计划，而是符合营养建议的最低限度的、能够适于饮食的食谱”（Hanson，2008，第573页）。世界银行和其他研究贫困问题的研究人员，包括贫困国家的研究人员，在制定贫困线时都没有采用最低成本法[[20]](#footnote-19)。Ravallion等人(2009)为确定世界银行2005年ICP价格1.25美元的贫困线所使用的75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级贫困线中，没有一个是使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21]](#footnote-20)。相反，现代的方法是根据每个国家国民的普遍口味习惯确定一个食品篮子，同时做到既尊重当地的饮食习惯，又符合专家建议的营养摄入量[[22]](#footnote-21)。

那么，Allen提出重新启用Stigler最小成本法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愿意把营养摄入量（相对于规定的要求）与福利等同起来，那么Allen的建议就接近于第二节中描述的福利主义模型。然而，这个假设很难得到捍卫。即使人们认为营养状况是决定人类福利的唯一因素，但在不太健康的环境中，人体对营养素的吸收率也比较低。因此，定量的营养摄入量不一定是营养状况最好的指标，比如人体测量数据所显示的营养状况。抛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们还可以质疑营养状况是否是一个足够全面的福利指标。正如本文第二节所指出的那样，在测算贫困时，过于片面地思考相关的锚定功能性可能具有欺骗性。当福利取决于营养状况（相对于需求）和社会包容度时，忽视后者可能会导致福利与贫困测算标准不一致。可信的测算标准要求我们要考虑到社会包容的作用，因为它既是影响特定社会背景下与实现营养需求相关的食物消费组合的一个影响因素，也是福利的一个独立决定因素。这一点在贫困研究的思想史上并不新鲜，但其重要性被基于最低成本的营养绝对测算标准低估了。

Allen承认他的解决方案对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来说是不合理的，但他声称该方法对贫困国家的穷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必需品取代了欲望”（这是Allen论文的标题），所以“线性规划方法能更为贴切地描述贫困人群的境遇”（Allen，2017，第3695页）。然而，与这一观点相反，从全球贫困人口的消费行为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营养摄入量[[23]](#footnote-22)。Allen自己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实际消费，他的线性规划预测中粮食谷物和脂肪含量较高，而肉类、鱼类、蔬菜和水果含量较低（Ravallion，2018b）。在他的线性规划方案中，消费多样性明显不足，这与Stigler和Smith对美国的研究结果一致。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食物和非食物的选择显然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消费的社会角色、当地社区的连接性等等。最低成本的营养充足的食谱，在今天的贫困国家，很可能和Stigler的食谱在1940年代的美国一样，无法被现实社会所接受。

Allen(2017)声称，他计算得到的贫困线高于世界银行每天1.90美元的标准。从表面上看，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正常的预期是,按照他的方法获得的贫困线应该会更低一些。然而，仔细阅读Allen的论文，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当我们将论文的最终版本与工作论文版本（Allen, 2016）一起阅读时，就会发现他在两个版本中对自己计算得到的数字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强调其与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有较大的一致性。人们总是可以提高对营养素摄入的要求，从而提高相应的贫困线标准。那些更符合实践经验的营养素摄入标准所产生的总体贫困人数要明显低于世行标准下的统计数字[[24]](#footnote-23)。Allen使用的ICP价格存在城市偏差，也可能导致其计算结果高于世界银行用以锚定国际贫困线的贫困国家线。

这一点对于跨期比较结果有影响吗？Allen并没有提供他的跨期贫困测算标准。Ravallion（2018b）比较了使用Allen标准线和世界银行标准线对一组共同国家的估计值差异。使用Allen线的1990年人口加权贫困率和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9美元的贫困率分别为45%和50%。对于Allen的贫困率，20年内的下降幅度是33.6%，而世行线贫困率的下降幅度则为33.8%。两种标准在一段时间内的表现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世界银行的方法和艾伦的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但两种方法测算下的全球贫困水平（至少对艾伦的一些营养标准而言）和一段时间内的趋势非常相似，这一点令人欣慰。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详细地表述另一部分文献，这些文献对社会包容所产生的功能性给予了更多（更明确）的强调——也对全球贫困状况给出了更为清晰的分析。

**五、相对贫困测算**

第2节中的理论模型假设，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相对收入，这意味着在较富裕的国家可能需要较高的实际收入才能达到与其他国家同样的福利水平（如(1)式所示）[[25]](#footnote-24)。这一点得到了各方面文献的支持。长期以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文献都强调了羞耻感、耻辱感、相对剥夺和社会排斥的重要性[[26]](#footnote-25)。这些“社会效应”对福利的影响在经济学中也受到了关注，例如：Duesenberry（1949）建立了相对消费如何影响储蓄的模型，Hirsch（1977）和Frank（1985）考察了人们对某些消费品的评价如何取决于与其他消费的比较，Cohn等（2014）考察了工作努力受相对工资影响的论点和证据。福利取决于相对收入的观点在关于福利的主观自我评价的调查数据中也得到了支持（Luttmer，2005；Knight等人，2009）[[27]](#footnote-26)。这一观点也被用来解释“Easterlin悖论”，即平均幸福感似乎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多少（Easterlin，1974；Clark等人，2008）。

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在较贫困的地方，这些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然而，这一点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人类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记录与如下观点相一致的人类行为：社会效应对穷人也很重要。例如，见Geertz（1976）和Fuller（1992）。Rao（2001）描述了庆祝活动对印度农村贫困人口社会网络的重要性。Banerjee & Duflo（2008）在一些国家的调查中记录了季度贫困人口在庆祝活动和节日上的支出。我们观察到贫困人口的此类行为有很多潜在的原因。一种可能是直接的相对比较。另一种更间接的原因是：这种行为可能源于反复互动的环境中的保险动机（如Ravallion，2008）。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即使你是穷人，你身边的其他人的收入也很重要[[28]](#footnote-27)。

在将这一思想贯彻到计量实践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两个不确定性的来源，而这两个来源在文献中多少被忽略了。首先，我们说人们（包括穷人）关心相对收入，但并不意味着相对收入与经济福利的概念有关，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根据这个概念来判断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穷。我们必须对什么是经济福利作出判断，同时认识到这一判断的结果并不一定需要与效用最大化选择理论相协调（第2节）。

第二，相关的比较群体是什么？关于该群体的相关统计数字是什么？在测算全球贫困的背景下，自然要把比较群体看作全国人民，尽管实际上的比较群体更多是地方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此外，相关统计数字通常应该被看作是平均数、中位数，或是其他统计指标。

**强相对贫困线**：测算相对贫困的最常见方法是将每个家庭的收入与贫困线进行比较，该线的确定是该家庭居住国当前中位数的固定比例。这个相对贫困线(zR)可以用一般形式写成：

 (5)

此处k是常数，y（.）是分位数函数（CDF的反函数），πz是定义比较组的固定百分数。在Fuchs(1967)最初提出的例子中k=πz=0.5，此后也有使用者采用其他参数值。这种方法在一些统计机构(特别是欧盟统计局和OECD)和一些研究人员中很受欢迎。例如，Garroway和de Laiglesia(2012)在为OECD工作时，使用πz=0.5和k=0.4、0.5、0.6来测算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困程度。

第2节中提出的观点是，以平均水平的恒定比例确定的贫困线一般来说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福利一致性，这一点也适用于比较收入为y(πz)时的情况。其他问题也很重要。我们目前不清楚的是，为什么任何固定的百分位数的数量级都可以确定一个合理的比较收入。为什么高于或低于这个量级的收入不会得到一个正的权重赋值？美国是一个有趣的例子。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制定的“补充贫困测算标准”（SPM）承认了过去人们对美国官方贫困线没有实际更新的担忧（Short, 2012）。(如图1所示，官方贫困线远低于人们对平均收入的期望值)。SPM使用了被认为是“必需品”（包括食物、衣服、住房和水电费）的消费子集支出分布的33百分位数水平的量化指标，这一处理参考的是Citro和Michael（1995）的作法。（因此，SPM在（5）式中设定k=1.2，πz=0.33。）然而，仍然不清楚为什么y(πz)在任何固定的πz下都是一个合理的比较收入水平。在SPM的例子中，也不清楚为什么相对比较只适用于“必需品”。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期望人们对于“非必需”商品的相对被剥夺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

Ravallion和Chen（2019）提供了一个包含向上和向下进行相对比较的收入比较理论表述。该模型指向的不是普通的均值或中位数，而是分布修正后的均值，其属性取决于人们在评估自己相对于他人的境况时，是倾向于向上看还是向下看（以收入为指标）。一旦解决了其他一些问题，讨论就会回到比较收入上。目前，人们可以把居住国收入的简单平均数作为比较收入基准。

当贫困线标准定在平均数（或中位数）的恒定比例时，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由此产生的贫困测算结果完全取决于人口中相对收入的分布情况。如果所有收入水平都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或收缩），那么当贫困线定在平均数或中位数的固定比例时，贫困程度将保持不变[[29]](#footnote-28)。在使用强相对测算标准时，人们发现了看似不正常的贫困比较结果[[30]](#footnote-29)。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贫困线与收入平均数的平均弹性约为0.5左右，明显(且显著)低于1。

强相对贫困线标准在贫穷国家的应用尤其值得怀疑。Ravallion(2012)指出，如果使用设定为平均数一半的强相对线水平，那么对全球最贫困的15个国家来说，其收入平均值仅为每天0.64美元(2005年ICP价格)，这大约是Lindgren(2015)估计的最低生存水平，即每天0.67美元(也是2005年ICP价格)。对于收入均值最低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只有每天0.38美元，几乎不太可能在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时间里满足个人的生存需要。同样，Garroway和de Laiglesia(2012)的测算标准假设的线远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典型值，甚至低于可能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最低值。

简而言之，强相对测算标准几乎肯定会低估全球贫困人口的营养和社会包容需求，这一点对于讨论这些测算标准如何应对经济增长和经济萎缩的情形似乎具有不良影响。虽然强相对测算标准在富裕国家更受欢迎，但在其他地方却很难令人接受，因此这种测算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也很难令人接受。

**弱相对贫困线**：针对强相对测算标准的缺陷，有文献已经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其中，Kakwani (1986)提出：

 (6)

其中ZA（>0）是一个绝对线，应被视为一个给定值，m是总体的均值或中值，β是一个参数。如果0<β<1，那么贫困线弹性（取决于m）为正但小于1（即为弱相对）。随着m取极限，弹性的极限为1。Chakravarty等人（2015）提供了形如（6）式中直线的公式推导。Jolliffe& Prydz（2017）和世界银行（2018）使用了基本上相同形式的曲线簇，这些结论一般化了Garroway＆de Laiglesia（2012）所提出的建议，即允许发展中国家拥有正截距——正截距就意味着弱相对贫困线。

Foster（1998）给出了另一种方法，使用一条绝对贫困线的几何均值，以及一条强相对贫困线。这与根据国家固定效应模型中测算的国家贫困线所估计获得的0.5的弹性非常吻合（本文第3节）。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弹性。正如我们所见，弹性随着平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本文第3节）。Kakwani的提议是允许弹性发生变化，并且在收入较高时趋近于1。当我们试图通过各国的贫困线寻找一种具有全球一致性的贫困线簇时，这种提议是更具有吸引力的。因此，下文的讨论将以（4）式为出发点。

当m<ZA时，（6）式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此时隐含的贫困线将低于ZA，而我们无法排除这种情况。实际上，Ravallion＆Chen（2019）所使用的数据表明，非OECD国家中有11％的情况就是如此。选择一种混合型“绝对+相对”（A+R）曲线簇能够规避这些问题，这种形式是分段线性形式：

() (7)

（需要注意的是，A+R线永远不能低于绝对线。）上式是Ravallion& Chen（2011，2013）所使用的公式。这种作法在Atkinson & Bourguignon（2001）、Atkinson（2019）中也能找到范例。然而，这其中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Atkinson & Bourguignon所使用的贫困线是（7）式的一种特例，其中设定了α=0，也就是说，当收入超过某个关键值（ZA/β）时，该贫困线将成为强相对线。由此，前文提到的不利于强相对贫困线的论点又再次回来困扰我们了。作为替代，（7）式通过增加参数α，对Atkinson & Bourguignon（2001）提出的式子进行了一种直接的一般化处理。这里添加的α可以理解为社会包容需求的下界。

**实证实践**：我们在第4节中看到，世界银行的“绝对”标准线是根据贫困国家的国家标准线设定的。国际相对贫困线也是以各国的贫困线作为锚定基准。但是如第3节所讨论的，现在的焦点在于，它们是如何根据各国的平均收入而变动的。这就是本文所遵循的方法，与现有文献保持了一致性[[31]](#footnote-30)。

但是，目前公认的一点是，关于任何福利潜在参考水平的差异是否能在统计上被忽视，我们尚无定论（这一点在第3节中也有提及）。较富裕的国家可能倾向于使用更为慷慨的参考福利水平来定义贫困。那么，真正与福利相一致的贫困测算方法将会以ZA为上限，以ZA+R为下限（Ravallion & Chen，2011，2019）。如果选择使用Atkinson & Bourguignon（2011）的方法，那么这一点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此时我们将（预测的）国家贫困线理解为不同国家实现社会包容的一种成本反映，而绝对线则理解为维持生存能力的需求成本。根据这种解读，实现社会包容需要一个人在所属国家生活在一个参考福利水平的上方。就此，我们根据比较收入的变化解读贫困线的梯度，同时也考虑到参考福利水平变化而产生的任何效应。

对于绝对贫困线（7式中的ZA），我们会使用世界银行的每天1.9美元的标准（2011年价格）。遵循既有文献的作法，弱相对曲线簇会根据各国贫困线进行校准。国家贫困线数据显示，根据排序加权均值能够获得相对比较收入——最富有的国家被赋予最低的权重（Ravallion & Chen，2019）。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计算一个根据基尼系数贴现的均值，即 ，其中Gj是国家j的基尼系数。通过对图1中国家贫困线数据库进行校准，就可以获得下列A+R曲线：

 (8)

因此，如果一个人既不是绝对贫穷（相对于ZA），又不是“国内贫穷”（相对于所属国家标准），那么他就不属于“全球贫穷”。

图3在全球基础上开展了上述测算方法，使用了1999-2013年间横跨150个国家1500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对于绝对测算法和A+R测算法，全球生活于贫困状态的人口比例都随着时间不断下降。在A+R测算法下，贫困率的下降平均速率为每年0.7%（年份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688；标准差为0.028）。绝对测算法获得的下降速率为1%,每年（系数为-1.055，标准差为0.043）。如果这种情况得以维持，那么到2025年时，使用1.9美元贫困线测算得到的全球贫困率将为0。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看到的，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自下而上”的视角时，随着贫困率不断降低，全球似乎很难维持同一个减贫速度。

根据A+R贫困线下的结果判断，全球贫困率下降源自绝对贫困人数的下降。事实上，属于相对贫困而不属于绝对贫困的人口比例——绝对与A+R贫困线下贫困率的差——在随着时间推移而上升，其上升的速率约为每年0.4%（0.367，标准差0.025）。在1990年，又18.5亿人（全球35%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下方，另有7亿人（全球人口的13%）生活在相对贫困之下，但不属于绝对贫困。也就是说，后一类人在各国的特定标准下属于贫困人口，但是不属于每天1.9美元标准下的全球贫困标准。到2013年时，全球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已经下降到了7.7亿（占全球人口11%），而A+R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下降幅度要小得多，降至23亿（占全球人口32%）。不属于绝对贫困但仍在各自国家属于贫困人口的人数在这段期间内翻了一番，从7亿人增长到了15亿人。

图4提供了全球生活在A+R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发展中国家绝对贫困人数是指生活在每天1.9美元标准线下的人数，而“发展中国家相对贫困人数”是指发展中国家生活在每天1.9美元线与A+R线之间的人数。“高收入国家”的贫困人数适用于A+R线，这些人口几乎全部生活在相对贫困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看到，根据1.9美元计算的全球贫困人口数量下降了，但同时发展中国家非绝对贫穷但生活在A+R贫困线下方的人数却上升了。在生活水平高于绝对贫困线的人中，只有不到80%的人最终生活在两条贫困线之间——在全球绝对贫困线水平下,他们不再贫穷，但按照他们各自所属国家的特定标准，他们仍是贫困人群。

无论是只关注“绝对贫困”，还是A+R线标准下的贫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发生率整体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通过A+R线计算获得的贫困人口中，有90%以上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使用更低的贫困线计算，几乎所有贫困人口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我们观察到如果按各自国家的特定标准来看，贫困人口的数量仍在增加。

**六、结论**

本文认为，全球贫困测算标准应该基于营养状况和社会包容这两个关键的功利指标，并以一个普遍适用的经济福利概念作为基础。国际贫困线可以被理解为这种福利概念的货币指标。当仅仅只看营养水平这一项指标时，是不足以认定贫困的。如果人们并没有根据自己的收入和食物价格，来最大化所摄取的热量（这一点几乎是显然的），那么我们就无法将给定营养状况的最低成本作为设置贫困线的一种指导标准。在包含贫困国家的贫困分析中，我们应当合理地考虑相对受剥夺状况和社会包容的理论地位。

当前设定国际“绝对贫困”测算标准线的方法是不充分的，因为其并未考虑经济福利，实际上有一部分取决于个人在社会中的相对收入，以及在富裕国家中较高的社会包容成本——通常使用的PPP平减指数很难做到这一点。当前测算“相对贫困”的方法也不太充分，因为这些方法通常假设个人经济福利取决于给定相对收入下的自身收入水平。假定个人的自身收入和相对收入都很重要，那么贫困线标准对于收入均值的弹性应该为正，但小于1。这样一来，实践中所使用的绝对标准和强相对标准就都被排除了。为了同时体现生活存续和社会包容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使用一种混合绝对与弱相对标准测算的方法。我们提出了一种方法确定一个人是否贫困：看他是否低于全球普遍标准，或者低于所属国家给定平均收入之下的特定标准。这为我们提供了真正的全球贫困测算标准，涵盖了各个发展水平的国家。

本文提供了说明性的计算过程。按照绝对贫困线和“绝对加相对”贫困线标准，全球减贫都取得了明显进展。尽管相对贫困的人数在增加，但是这些人都已脱离绝对贫困的范畴。在富裕国家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真正符合贫困国家绝对贫困标准的人口非常少，但是如果按照本国“贫困”的含义，他们仍然很贫穷。

**作者简介**：Martin Ravallion供职于乔治城大学经济学系。

**图1: 各国贫困线**

（a）全样本 (n=146)



（b)非OECD国家（n=122），使用对数规模作为均值



**图2:不同贫困线下的全球绝对贫困率**



资料来源: [PovcalNet](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povDuplicateWB.aspx).

 **图3:全球绝对和相对贫困测算结果**



Source: Ravallion & Chen (2019).

**图4:A+R贫困线下全球贫困人数的组成部分**



注: 全球总数是生活在ZA+R线下方的总人数。“全球发展中国家绝对贫困人数“是生活在ZA线下方的人口，”发展中国家相对贫困人数“是生活在两条线之间的人口。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减贫前线·*

**尼泊尔在新冠疫情期间加速推广远程学习**

[Karthika Radhakrishnan-Nair](https://blogs.worldbank.org/team/karthika-radhakrishnan-nair) [Cristian Aedo](https://blogs.worldbank.org/team/cristian-aedo-0)

[Mohan Prasad Aryal](https://blogs.worldbank.org/team/mohan-prasad-aryal) [Maya Sherpa](https://blogs.worldbank.org/team/maya-sherpa) [Uttam Sharma](https://blogs.worldbank.org/team/uttam-sharma)

Sikshya Kafle生活在尼泊尔特莱省的班克地区，往年这个时候，她正在急切地等待她的学期春假。但今年的情况不同，因为她的学校早已关闭。在2020年3月19日，尼泊尔政府官方宣布关闭所有教育机构，以防止新冠肺炎的快速传播。四天后，尼泊尔宣布全国封闭。九年级的Sikshya告诉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我很想念学校里的朋友，也担心学习进度赶不上。”

自2020年3月以来，疫情发展使得尼泊尔全国大约820万儿童远离了课堂，对他们的教育进度构成了损害。即使是在疫情发生前，尼泊尔也深受教育危机的困扰：该国大约一半的学生，无法保证足够的阅读量。现在随着疫情的肆虐，尼泊尔的教育情况有恶化的风险：辍学率上升，情况不佳的学生将远远落后于进度。

**尼泊尔政府正寄希望于远程教育**

在当前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尼泊尔政府将确保教育置于全国紧急应对疫情的中心位置，并且希望通过加速建设远程、互联网教育来对冲学校关闭所带来的冲击。为此，世界银行近期组织了一项名为EdTech的研讨会，来讨论适用于尼泊尔的远程学习方案。该国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是数字设备覆盖率在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参会者都表现出对多种技术手段应用于支持并且可持续进行线上教育的热情：包括无线电、手机、电视和其他一些在线技术手段。

其中有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是由教育科学技术部门构建的学习门户网站，其中含有交互式学习、课堂视频、音频和电子书等数字内容。这个网站的学习内容会根据学生年级和主题进行了分类，以便用户导航，同时也便于尼泊尔课程开发中心对网站内容进行监督。最近，尼泊尔的教育科学技术部发布了一套新的指导手册，用来促进学生通过多种可选的替代途径来进行学习。

为了解决儿童在新冠肺炎期间面临的严重学习差距，一个由教师、教育记者、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和地方广播电台组成的联盟还推出了一个名为“广播学校”的远程学习广播节目。在尼泊尔的五个地区，该节目使超过十万名一年级至十年级的儿童受益。

“广播课将教育和娱乐元素进行组合,来提供科学、数学、英语、尼泊尔语和社会研究的课程，”尼泊尔救助儿童会的教育顾问、EDTech项目的参与者Laxmi Paudyal博士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学生通过电话、问答比赛、社交媒体讨论等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学习活动。”

对于Sikshya来说，广播学校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使她大松了一口气。“以前我都是通过手机和朋友们联系，现在我经常用手机参与广播学校的课程。”她说。“我迫不及待地想参加下一届的演讲比赛了,我要讲讲联邦制对我所在社区的影响。”她兴奋地补充道。

**缩小学习的差距**

尼泊尔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能够收看广播或有线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使用率很低，而且各省、各民族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之间也不平衡。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收音机。

但是，手机的普及率很高，尼泊尔每五户家庭中就有四户拥有手机。这个比例在各省都差不多，这使得孩子们有可能用手机连接到播放学习节目的地方电台。

来自尼泊尔根杰（Nepalgunj）的中学教师Shanti Kandel深知广播节目对她所在社区的贫困、弱势儿童的意义。

“大部分学生家里都有手机，他们现在都用手机接入广播学校。"Shanti说，她每周日还在当地电台用尼泊尔语授课。“危机把当地教师聚集在一起，我们轮流通过广播电台备课和授课。”

缩小尼泊尔在数字学习方面的差距，需要对所有可用的教育材料进行评估，并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协调，通过电视、广播、移动电话和印刷媒体等播放课程内容。

在短期、中期的优先目标是将各个年级中有障碍的学生包容到学习进度中来,对于那些无法获得任意一种媒介工具的边缘孩子，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带有已上传教育内容的相关媒体设备。

考虑到网络连接情况在尼泊尔是一个严重的瓶颈问题，政府应该与网络、通讯提供商之间开展合作，为学习终端提供零带宽、零成本的网络接入条件。这就要求许多省份加装新的服务器、网络硬件设备，从而满足更高的网络需求。老师们也需要接受更多训练，来掌握相关技术，从而更好地为孩子们提供远程教育。

新冠肺炎疫情检验了尼泊尔教育体系的极限，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仍需要采取众多措施来得到提升。然而，疫情的蔓延也揭示了一国如何能够快速地面对挑战，确保自己的儿童能够持续性地接受教育。这些都将为尼泊尔后续的发展和繁荣提供助力。

**作者简介**：

Karethika Radhakrishnan-Nair是世界银行高级教育专家；
Cristian Aedo是世界银行项目实践经理；

Mohan Prasad Aryal是世界银行高级运营官员；

Maya Sherpa是世界银行经济分析师；

Uttam Sharma是世界银行咨询师。

**原文链接**：https://blogs.worldbank.org/endpovertyinsouthasia/nepal-steps-remote-learning-during-covid-19

*·书籍推荐·*

**书评：《穷人的银行家：小微贷款与全球减贫斗争》**

Muhammad Yunus是那种罕见的人物：一个真正的远见卓识者。他的梦想是彻底消除世界上的贫困。1983年，Yunus不顾银行业和政府官员的建议，成立了Grameen银行，这是一家致力于为孟加拉国最贫穷的人提供小额贷款的银行。Grameen银行坚信信贷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不是少数幸运儿的特权。现在，这家银行为孟加拉国农村的200多万个家庭提供了超过25亿美元的小额贷款。Yunus的客户中有94%是妇女，还款率接近100%。在世界各地，受Grameen启发的小额贷款计划正在蓬勃发展，仅在美国就建立了300多项类似的计划。

《穷人的银行家》一书是Yunus的回忆录，讲述了他是如何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以帮助世界上的穷人。在书中，他追溯了导致他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贫富之间经济关系的知识和精神之旅，以及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创立Grameen时所面临的挑战。他还为任何愿意和他一起“把无家可归和赤贫放在博物馆里，以便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参观它，并问我们怎么会允许这样可怕的事情持续这么久”的人提供了明智的、充满希望的指导。《穷人的银行家》是直接来自小额信贷构想者的权威历史，对于任何对经济学、公共政策、慈善事业、社会历史和商业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励志读物。
 Yunus出生于孟加拉国，在美国范德堡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深受民权运动影响。他至今仍住在孟加拉国，并带着Grameen银行和小额信贷的理念，在世界各地旅行宣讲。

**如何消除贫困？**

这个周末，我参加了由西雅图太平洋大学商业诚信中心主办的“底层/底线”论坛。这次活动是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学术界之间的交汇区，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企业帮助减轻世界贫困的方法。

在会议上讨论了许多有趣的主题，小额信贷的话题似乎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对于那些不熟悉这个术语的人来说，小额信贷是指银行或非营利组织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利用这些小额资金开始创收事业。

Grameen创始人，《穷人的银行家》一书的作者Yunus指出，穷人唯一缺乏的就是机会。他写道：

"当你把世界捧在掌心，只从鸟瞰的角度去视察时，你往往会变得傲慢——你没有意识到，从巨大的距离看事物会变得模糊不清。而我则选择了用“虫眼看世界”。我认为，如果我近距离地研究贫困，我会更深刻地理解它。"

**慈善与小额贷款**

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穷人会以高昂的利率向放贷者借款以参与经济活动。到头来，这些人在付出利息之后只能赚到微博的收入来养家糊口。Yunus想，如果能以低利率贷出这些微不足道的钱，穷人就可以享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劳动产品的乐趣，从而创造经济资本，摆脱贫困。

相比之下，慈善是无偿地给予，不期望回报。很多人提出，纯粹的慈善并不能消除贫困，因为穷人会对接受援助产生依赖。有一位博主Filip Spagnoli在他的网站上汇总了国际发展援助的情况。根据他所整理的证据表明，这些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援助数量惊人，然而经济增长却没有因此而加速。

如果援助以贷款的形式而不是慈善的形式出现，其作用是否会有所不同？Yunus认为，向穷人提供贷款是最好的投资。许多陷入贫困循环的人都很聪明，也很勤奋，他们只是需要钱来启动他们的商业生涯。虽然大银行通常认为小额贷款既有风险又无足轻重，但Yunus认为穷人拥有最高的还款动机。

当然，当自然灾害和经济崩溃等意外问题使穷人陷入无力偿还贷款的境地时，Yunus会给予宽限，贷出更多的钱，帮助穷人重新站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小额贷款鼓励了企业家精神。如果说慈善事业是给一位离婚妇女一条鱼，小额贷款则是教她如何钓鱼。

**什么是最好的事情？**

虽然慈善捐赠本身从来都不是坏事，但我不知道它对于减贫来说是不是最好的举措。当然，不求回报的免费礼物对接受者来说是最高的祝福，然而从长远来看，我不知道小额贷款是否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当然，对于那些穷到借来的钱都会用来维持生存的赤贫者，慈善捐助是必要的。然而，中等程度的穷人需要一个启动点，小额贷款似乎是缓解这些困境的最佳选择。

Yunus以自传体的口吻写了《穷人的银行家》。他竭力将这本书定位为个人在持续的反贫困斗争中的成功故事。当然，他的立场似乎可以而且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复制。然而，Yunus写得很谦虚。如果你对消除贫困的方法感兴趣，除了给你最喜欢的非营利组织捐款之外，我建议你读一读这本书。

**书籍信息**：Muhammad Yunus, Banker To The Poor: Micro-Lending and the Battle Against World Poverty, Publisher: PublicAffairs; Later Printing edition (January 8, 2008).

**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协 办**: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

**主 编**:刘俊文

**副 主 编**:谭卫平、张广平、徐丽萍、夏庆杰

**本期编译**:顾思蒋

**责任编辑**:贺胜年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

**邮 编**:100028

**电 话**:010 84419659

**传 真**:010 84419658

**电子邮箱**:xuliping@iprcc.org.cn

**网 址**:www.iprcc.org.cn

1. 关于这一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这一链接，获取1700年以来的相关历史信息：<https://books.google.com/ngrams/graph?content=poverty&year_start=1700&year_end=2010&corpus=15&smoothing=3&share=&direct_url=t1%3B%2Cpoverty%3B%2Cc0>. [↑](#footnote-ref-0)
2. 我们有时会使用“收入贫困”的概念，但是其他变量也常常被我们包含在计算范围中。 [↑](#footnote-ref-1)
3. Fuller对这些因素作了讨论，并且借此强调了他对贫困测算的观点。详情可见Ravallion (2016)和Atkinson (2019)。 [↑](#footnote-ref-2)
4. 隐式(1)对m求偏导，其中一个解为 $0<\frac{∂lnz}{∂lnm}=\frac{1}{1+mMRS}<1$，其中$MRS≡v\_{y}/v\_{{y}/{m}}(>0)$。 [↑](#footnote-ref-3)
5. Sen (1987)讨论了经济福利（生活标准）与功利性的关系。 [↑](#footnote-ref-4)
6. 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是否要将这些其他维度分开考虑，还是将他们综合纳入一个混合的指标之中？进一步讨论见Ravallion（2011)。 [↑](#footnote-ref-5)
7. 这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性假设，与消费者理论相类似。 [↑](#footnote-ref-6)
8. 给定（p,q,y,x）的数据，假定我们在标准假设下能够倒推整合出某种间接的效用函数V[v（y,p,x）,x）]。那么任何函数V[v(y,p,x),x]同样会与这些数据相一致。这涉及到一个长久以来持续存在于福利测算中的识别问题，在设定等价范围时经常发生 (Browning, 1992)。 [↑](#footnote-ref-7)
9. 此处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全球贫困测算。对于国别层面更好近似结果的研究，可以参见Ravallion & van de Walle (1991)，以及 Dimri & Maniquet (2018)。 [↑](#footnote-ref-8)
10. 参见Ravallion (1991), Atkinson & Bourguignon (2001), Ravallion et al (2009), Ravallion & Chen (2011, 2019), Jolliffe & Prydz (2017) and Atkinson (2019)。 [↑](#footnote-ref-9)
11. 术语“发展中国家”可能有多种定义，在本文中则可以理解为世界银行定义的第二类成员国家。 [↑](#footnote-ref-10)
12. 进一步对于该方法在设定贫困线实践中德讨论，可以见Ravallion（2012, 2016, Chapter 4）以及Atkinson （2019, Chapter 2）。 [↑](#footnote-ref-11)
13. 例如，在确定接受资助资格时，美国的一些扶贫计划使用的是官方贫困县的数倍标准。 [↑](#footnote-ref-12)
14. 这里指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该国的均值异常低。如果使用平均值平均值第二低的国家马达加斯加，那么预测的贫困线水平将为1.28美元。 [↑](#footnote-ref-13)
15. 在中国平均收入上升为原来四倍的这段时期内，中国的官方贫困线标准也提高了一倍，而印度的贫困线也在实际层面作了调增 (Ravallion, 2012)。印度尼西亚的作法是将官方贫困线锚定于前一年人民平均消费水平的20%。Jolliffe & Prydz (2017) 给出了发展中国家调增其国家贫困线水平的其他例子。 [↑](#footnote-ref-14)
16. Jolliffe & Prydz (2017) 估算了118个国家的609个贫困线标准，这些标准隐含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的构建过程中。令$F\_{it}(.)$ 表示t时间国家i的拟合累计分布函数，$H\_{it}$为观察到的人口指数，那么银行的贫困线可以表示为$F\_{it}^{-1}(H\_{it})$。 [↑](#footnote-ref-15)
17. 使用国民总收入的对数替代调查平均值后为0.43，s.e.=0.01; n=595。 [↑](#footnote-ref-16)
18. 这一目标基于Ravallion (2013)的计算，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后者概述了到2030年整个发展中世界的贫困率将达到3%，而不是0。即使如此，仍然需要使大约10亿人摆脱贫困。本文将在第6节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footnote-ref-17)
19. 引用Stigler的话（1945，第313页）：“在饭桌上实行极端节约的做法，以过多的住房、娱乐或休闲为目的，那将是荒诞不经的。” [↑](#footnote-ref-18)
20. 该方法有时会被作为一种足量饮食成本的下界的“基准”（Masters等，2018；Hirvonen等，2019)。 [↑](#footnote-ref-19)
21. 我向三位世界银行的专家求证过这个问题，他们确认了这一点。 [↑](#footnote-ref-20)
22. 这一点同样显著的体现于这样的事实之中：移民的消费模式无法快速地适应于目的地的新相对价格。以上结论可见Atkin (2016) 使用移民数据所做的研究。 [↑](#footnote-ref-21)
23. 对于支出模式的举例可见Banerjee & Duflo (2008), 对于印度的情况可见Rao (2008)，对于也门消费情况的讨论见Milanovic (2008)。第5节给出了进一步的例子。 [↑](#footnote-ref-22)
24. 正如Ferreira（2017）所指出的那样，在早期的工作论文中，Allen反而专注于构建一种营养摄入标准，结果发现他的营养标准线正好是平均每天1.90美元（Allen，2016）。Allen将此作为这篇工作论文的一个关键发现，认为他的方法“为每天1.90美元是一个好的标准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理由"（Allen, 2016, p.1）。在最终公布的版本中，故事发生了变化，Allen转而将重点放在了一个规范上，该规范给出了一个比统一的每天1.90美元的贫困人数更高的标准。对这一选择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已公布的版本预示着更高的贫困人数，而没有为他的其他规格提供任何贫困衡量标准。 [↑](#footnote-ref-23)
25. 回顾一下，富裕国家可能需要提高购买力平价的项目额度，以解决人们对非比较类商品的关切（第4节）。特别地，我们可能需要对住房费用给予更高的额度。这是测算绝对贫困的一个问题，并不是本节讨论的主题。 [↑](#footnote-ref-24)
26. 这些文献包括Davis (1959)、Runciman (1966)、Townsend (1979)和Walker (2014)。 [↑](#footnote-ref-25)
27. 对这一文献的调研可见Frey和Stutzer (2002)、Senik (2005)和Clark等(2008)。 [↑](#footnote-ref-26)
28. Smith等(2012)针对相对剥夺提供了一篇综述，涉及了多项研究。 [↑](#footnote-ref-27)
29. 请注意，该属性并不取决于贫困线锚定于均值还是中位数；在不平等程度保持中性的增长过程中，中位数与均值的比值是恒定的。但是，de Mesnard（2007）和Kampke（2010）都表达了对使用中位数的反对。 [↑](#footnote-ref-28)
30. 例如UNDP（2005，Box3）、Easton（2002）。 [↑](#footnote-ref-29)
31. 这些文献包括Chen & Ravallion (2001, 2011, 2013), Atkinson & Bourguignon (2001), Jolliffe & Prydz (2017) 和Atkinson (2019). [↑](#footnote-ref-30)